



古代快递那些事儿

□ 王路

孔子说过：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意思是，品德的流行，比驿站传递王命的速度还要快。置，就是春秋时传递文书的驿站。置是一种广泛的说法，传递文书用车叫传，用马叫驿，步行叫邮，统称为置。“传车”、“驿马”，就是从这里来的。

据《韩非子》记载，当时五里一置。到了秦汉，驿站一般相隔三十里。驿站里有传舍，可供过夜。这是最早的官方招待所。两驿之间，十里设一亭，五里设一邮，刘邦出道之前，就在亭上上班。汉朝从民间举荐贤才，由卫尉之下的“公车司马令”负责接待，称“公车上书”。清末康梁的公车上书，就是从这里得名。

汉朝公文传递速度很快。西汉时，公文从金城到长安，来回只用七天。金城在今天的甘肃永靖西北，到西安720公里，可见每天要走400里以上。当然，那是最快的一种，叫“奔命书”。今天说的“奔命”的“命”，不是“性命”，而是“命令”。秦汉时的地方预备兵，叫“材官”，一旦上头有命令，就要立刻奔赴，因此叫“奔命”，曹子建所谓“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是也。

唐朝有驿站1643所。这时驿站的功能是兼传递文书和招待官员为一体的。也有私人旅店，叫“逆旅”。李白《春夜宴诸从弟桃李园序》说：“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就是说天地不过是万物的旅舍。这也可见，李白出行住的是私人旅店，不是官家招待所。因为住驿站需要驿券，在京城由门下省发放，在外由诸军州发放。不同级别的官员，享受不同的待遇，驿站提供的食宿不得超过三日。如果五品以上的官员因私出差，可以住驿站，但得自行解决伙食。

唐朝有驿有传，驿是日行六驿，180里左右，传是日行四驿，120里左右。最快的是敕书，因为牵涉人命，日行十驿。杜牧诗“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就是通过驿站传递荔枝。不过驿递荔枝的西汉朝已有之，当时南海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腾险阻，死者继路。杜甫诗说：“忆昔南海使，奔腾险阻。百马死山谷，至今耆旧悲。”借汉朝来讽唐朝，是唐代诗人最喜欢干的事。唐朝的边疆，还有用驿马传递的，叫“明使”。《杨太真外传》中说是杨贵妃发明的，明使速度很快，传说日行千里，《木兰诗》“愿驰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是也。

隋唐时期，还有“邮筒”，不是今天的邮筒，倒类似今天的漂流瓶，是将信装在竹筒里，漂流而下。唐朝的“飞钱”，类似邮政储蓄，在地方驻军办事处存钱，可以到地方官府凭据取出。唐朝寄私信是熟人捎带，张籍写诗说：“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而官方邮递是不能这样滞留的。私邮一般通过“驛脚”，驛脚是酒肆里备的，并不属于驿站。到了宋朝，欧阳修给人写了篇《相州驿记》，有两句“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寄出后觉得不妥，又改了稿子派人骑马快马赶上，原来只是改成“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

宋朝是枢密院管驿递，元丰年间，改由兵部之下的驾部管理。驾部，顾名思义，类似20世纪的交通部和邮电部。宋朝以前，平民负责驿递的差使。宋太祖建隆二年下令，用军卒代替百姓为役夫。宋朝的驛券叫“走马头子”，是枢密院发放的。五代以来，都是凭传驛领驛马，宋朝有个叫李飞的，用假传驛一路吃喝诈骗，震惊了宋太宗，于是太平兴国三年，改用银牌。端拱二年，发现银牌还是麻烦，又改用传驛。

宋朝招待所和邮局的职能已经分离了，招待所叫驛馆，邮局叫递铺。秦观《踏莎行·郴州旅舍》中“可堪孤馆闭春寒”，指的就是驛馆。词里还有一句“驿寄梅花”，当然并非真快递梅花，而是用南朝的典故：陆凯和范曄是朋友，从江南给范曄寄了枝梅花，“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

宋朝的递铺专门负责传递文书，十八里到二十五里之间设一座，有步递、马递、急脚递、金字牌急脚递。岳飞被皇帝连下十二道金牌，就是“金字牌急脚递”，上书“御前文书不得入铺”。这种文书不能在递铺停留，快到递铺时摇铃，铺里人听见铃声候在铺口，像跑接力赛，一路鸣铃，过如飞电，行人望之避路，昼夜不停，日行五百里。此类文书一般是军机要务或者赦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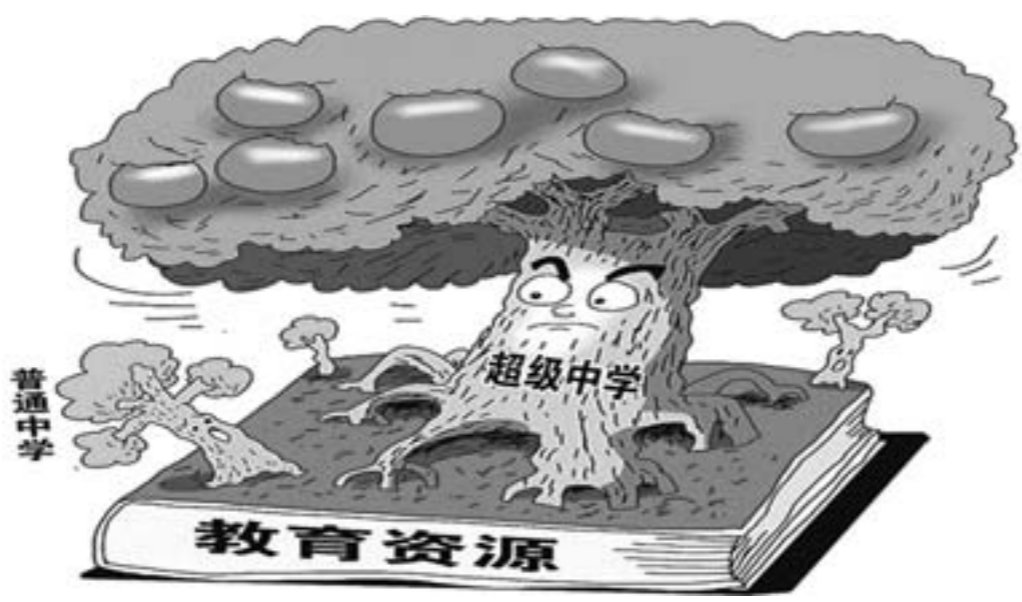
宋景德元年，下诏禁止三川峡路州、军、监、县、镇等吏卒乘马通报公事，因为马匹往来过于频繁，令人惊疑。这样，就有一部分马递需要用急脚递来代替。皇帝觉得急脚递太辛苦，下诏“河北两路急脚铺兵士，除递送镇定总管司及雄州文书外，他处文书不得承受”。当时急脚递服役很苦，河北沿边安抚司奏“河北诸州军马递铺兵士有父母骨肉散在诸铺者，乞配在一处”，朝廷允准了。又过两年，下令“诸州递铺兵士有子孙同在军籍者，许同营居”。

元朝急脚递代替了宋朝的步递，马递也消失了。递铺兵走递时，要裹毡、持枪、挟雨衣，夜里举着火炬，路上的车马闻铃都要避至路旁。每个递铺兵站十里。元世祖时，制定了《站赤条例》，管理驿站。站赤，即驿站，制定了站制古音译。站赤对百姓的盘剥很严重。

明朝，朱元璋下令，非军国大事，不能擅用驛马及邮递设施。有意思的是，他的两个女婿都因此犯事了。驛马郭镇从辽东回京，带了三红棒子，用驛马传递，朱元璋命他补了运费，并张榜明令禁止。而另一个女婿马欧阳回，用驛马走私茶，朱元璋直接把他杀了。正德年间，太监到驛站勒索驿银，海瑞等人极其不满。张居正对驛站进行了改革，无论是儿子回老家考科举，还是自己回老家给父亲祝寿，都没有动用驛马，完全自费出行。明朝在京的同乡会中，有每年回乡的人，专门负责给大家捎带私信。久之，形成了民信局。明末的李自成，也是银川的一个驛卒。

超级中学满足了哪些人的需求

□ 冯帮 李紫玲



“超级中学”是中国高中版的马太效应，其实是“重点校”的升级版。

备还是师资方面，大冶一中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在此基础上，2012年作为大冶一中建校百年，大冶市委、市政府在学校校庆工作全程中不遗余力地给予了支持。市委书记傅继成更强调要抓住机遇，举全市之力促进大冶一中的发展，促进大冶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而具备了一定的资源基础又掌握了政府的基本行为特点后，为获取持续、优先的教育资源支持，某些学校会利用地方政府的“偏爱”，优先升级学校硬件，壮大师资力量，吸收优质生源，来保证学校的办学效果，满足相关部门的政绩需求。另外，学校收取的学杂费、择校费、赞助费等都会通过专门的账户上缴地方财政，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政绩和经济的双重贡献，使得政府部门面对某些学校对高中“三限”等相关教育政策的“误读”而随意扩大学校规模的行为，极易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纵容态度甚至大力支持。南京一所四星星级高中的校长在“取经”衡水中学时指出，仅在招生制度上，南京乃至江苏就难以复制“衡水模式”，因为衡水中学不仅可以招收本市的初中毕业生，而且触角可以伸及河北全省，而在江苏，对于中考跨市招生一直有严格的禁令。至此，在教育资源整体不足的发展要求下，地方政府追求片面政绩观主导的“资源一成绩一政绩一资源”的利益链，及为实现教育对地方经济、社会效益最大化影响的政府行为，从现实层面主导了“超级中学”的形成和发展。

学校：“名利双收”诱惑下的盲目扩张

学校是专门从事教育工作的社会组织和机构，作为教育的主阵地，它的一切工作都应该致力于教育影响或作用的充分发挥和实现。然而作为以纳税人的税收为基础建立的公立学校，并非天然秉承着“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尤其在市场竞争浪潮影响下，学校必然会考虑学校竞争力、经济效益等问题。当前“超级中学”的出现及发展就是某些优秀学校在政府默许和支持下，一味追求学校名声和利益而盲目扩张的结果，这明显偏离了教育本质，将教育变成了逐利的市场行为。而生源作为学校效益的直接保障，成为了一些学校盲目扩张的首选。由此便形成了“超级中学”人数过多，规模堪比一般大学的一大“特色”。在河南省，实验中学本校和分

校师生人数已接近1万人，而作为县级正在崛起的“超级中学”夏邑县高级中学师生人数超过1万人，淮阳中学分校师生人数已经超过2万人。在建分校、建连锁机构、设国际部的大动作下，扩大“择校生”“条子生”之类招生名额是学校扩张的具体行为方式。

一些学校盲目扩张背后折射出的就是学校的逐利本性。在普遍的教育竞争中，为提高核心竞争力，学校往往以各种优越条件吸引优秀师资、网罗优质生源。一方面，这种提高核心竞争力的方式需要学校的经济基础来保证；另一方面，以优秀师资、优质生源为代表的核心竞争力也是学校优质效益的产出方，会为学校吸引庞大的择校群体，带来数目可观的择校费，进而保证学校的竞争成本。对优质生源的争夺，使免收学费甚至给钱、给物这样的招生“谍战”在各地上演。在江西，生源竞争同样激烈，江西多所中学校长都表示遭遇过所在地的尖子生被“临川一中”、“临川二中”花钱挖走的经历。当然这些“投入”都会在另一部分学生上收回。在学校的名声之下，非“尖子生”入学指标往往要数万，而非“招生范围”的学生光“入门费”就要交数万甚至十万元左右，这些暗中的“钱学交易”甚至每年会给学校带来上千万元的额外收入。至此，“钱”与“学”的“良性循环”就形成了学校扩张的直接动力。其次，在政府片面政绩观的导向下，学校校长的办学理念容易错位，从而带领学校走上一味追求“名利”的“超级化”发展道路。因为建立在优质资源基础上的办学效益不仅会为学校赢得社会信任与支持，而“一枝独秀”的“升学率”、“一本率”等作为校长办学的直观“业绩”，因满足了政府部门的政绩需要必然是校长考核的“亮点”，会为其未来发展奠定基础。在此前提下，校长极易因追求个人发展、办学政绩，使学校陷入盲目发展的境地。衡水中学前校长，现任衡水市教育局局长李金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承认：当年搞的是题海战术，拼学生、拼老师，做了不少违背教育规律的事。有些老师甚至体罚学生，采用棍棒教育，学生累得发昏，老师累得吐血。另外，衡水中学以军事化管理、绩效量化等现代公司管理手段为特点的“衡水模式”一直以来也饱受争议：一边被斥为应试教育的复辟和滥觞，一边又被捧作济世良药而被国内一些学校争相仿效。再次，对于学校教师，学校“升学率”、“一本率”上的辉煌战绩，既会为其

带来丰厚的奖金收入，又是对个人教学能力的肯定，还会为教师带来良好的社会声誉等。“名利”之下，教师必然“呕心沥血”投入教学，为学校的“超级化”奠定发展基础。无独有偶，在被称为高考造梦工厂的毛坦厂中学，其教学管理同样以严苛著称，班主任在开学初就会直接告诉学生“来到这里就是为了提高成绩考大学的，所以收起你的个性，老师叫你怎样就怎样”；有的班主任甚至还要求“统一上厕所，以免进出影响别人休息”。最后，学校的“名利双收”会使政府同样享受“名利双收”的成果，又会产生政府在政策、资源投入上向这些学校倾斜的反作用力，进而叠加一些学校的竞争优势，刺激学校的扩张欲望。

家庭：升学驱动引发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哄抢”

我国社会步入转型期以来，各种矛盾凸显，而精神文明建设滞后使全社会呈现出一种浮躁风气；另一方面，当前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的同时，却使贫富差距和阶层分化进一步加剧。在这样的背景下，教育领域优质教育资源的普遍稀缺，使得家庭极易在寻求个人教育发展保障下产生对以某些学校为代表的优质教育资源的集体“哄抢”，直接造成了一些优秀学校教育资源供不应求，进而助长这些学校“超级化”的发展势头。在衡水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地级市，放假时衡水中学校门口往往会有近4000辆小轿车；十年来衡水中学接待访问人数17万，如今进入学校参观须交600元会务费，但仍然阻挡不了“朝圣者”的步伐，社会对其追捧可见一斑。而在临川上顿渡镇，“临川一中”和“临川二中”这两所学校的超常规发展使得学校周边房价直逼中心城区房价，万余名外地学生和家长的到来直接带动了当地餐饮、住宿、交通和教辅行业的发展，有形象的说法“在上顿渡，几乎所有的生意都和教育局有关，只要搭得上教育就一定能挣钱”。在安徽省，毛坦厂镇的生活生产几乎围绕当地的毛坦厂中学进行，曾经的古镇也因此重新焕发了生机。

高考制度下，社会对普通高中的评价主要是看学校的“升学率”、“一本率”；对于学生、家长而言，学校的升学功能的首要的。这就必然使本身占据优质资源的学校，因学生、家长追捧而持续处于优势地位。另一方面也催生了有条件家庭竞相入学，想方设法抢占优质教育资源，无形中助长了合法化的择校费之“钱学交易”，和暗行、半遮半掩、甚至公开的“权学交易”。衡水中学副校长康新江就说：“我们衡水在河北经济排后位，但在石家庄那儿，几乎每个单位都有我们的家长。”从供求关系理论来看，“有需求就有市场”，社会浮躁风气和贫富、阶层分化的加剧使家长几乎“想方设法”为孩子争取优质的教育资源；而学生本人也不愿意在高考竞争中跑跑线上，进而竞相争取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当这种行为愈演愈烈，必然导致原本有限的优质教育资源更加供不应求，进而形成学校主导“卖方市场”，“超级中学”便应运而生。

“超级中学”是中国高中版的马太效应，其实是“重点校”的升级版。近年来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导致了学校间的生源竞争，城乡、校际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日益显著，不同学校间的“两极化”发展等因素共同助长了“超级中学”愈演愈烈之势，进而引发和激发了系列社会问题。总之，“超级中学”现象亟待“降温”。

(作者单位：湖北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把“打架”的地下管线纳入“共同沟”

□ 孙晓莉

发的管线事故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50亿元，间接经济损失达400亿元之多。

如果说城市风貌是城市的“面子”，那么城市基础设施特别是地下管线设施则是城市的“里子”。在我们的城市发展过程中，长期以来有一股“重地上、轻地下”、“重眼前、轻长远”的思维惯性。很多地方领导，抓经济建设的能力和水平很高，但是对于城市规划和城市的统筹发展重视不够，经验也比较缺乏。究其原因，在于传统的干部人事制度考核体制更容易激发人的短期行为，诱导人更为重视短期内能够产生可测量的成绩，对于较为长远的事情则关注不足；对于显著更为关注，对于潜绩则不那么重视。

此外，我们管理体制也存在着内在困局。目前国内大多数城市地下管线涉及11个管理部门，陷入老百姓所说的“多龙治水”的局面。城市管理上条块分割，规划与管理条块分割，建设与管理上条块分割，在总体上缺乏统一规划，统一分工，统一管理。

从社会组织学的角度看，组织之间的边界存在是合理的，但是边界的存在会产生大量消耗。在跨越边界的时候，会增加物料、能量、信息的消耗，边界越多，最后决策的不确定性就越大，盲目性就越大。所以，一件公共事务涉及到组织层次和部门越多，很可能该公共事务的运作效率就越低。

城市地下管线涉及到的众多部门当中，管理职能上相互交叉，职责不清，关系不顺。包括有关职能部门、管线产权单位、管线建设单位、勘测单位等在内的各方权力、责任、义务没有明确的界定，以至相关管理部门在地下管线的管理上不能协调一致，地下管线信息资源难以进行整合和有效利用。

另外，建设与管理脱节，缺乏强有力的统一协调，各部门多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各行其是，使建设和管理缺乏系统性、一致性。由于管线设施的权属主体混乱，管线“打架”现象时有发生。

目前，世界上比较先进的做法是采用地下综合管线隧道“共同沟”的模式来管理各种市政管线，即将设置在地面、地下或架空的各种公用类管线集中容纳于一体，设有专门的检修口、吊装口和监测系统，实施统一规划、设计、建设和管理。这是一种现代化、集约化的城市基础设施。

共同沟最早兴建于欧洲。1832年，巴黎在建设以排水为主的隧道时，创造性地在其中布置了一些供水、煤气管和通讯电缆等管线，形成了早期的共同沟。目前，巴黎已建成的共同沟超过100千米，且收容的管线也越来越多。西班牙目前除煤气管外，所有公用设施管线均进入隧道。芬兰将共同沟深埋于地下20米的岩层中，而不直接建于街道下，其优点是可节省管线路长度。

与传统道理相比，共同沟至少具有以下一些优点，如：可避免道路的反复开挖，从而节省建设资金；在更新、扩容、维修管线时不影响交通，有利于延长路面使用寿命；根据远期规划设计建成的综合管沟，能充分利用地下空间资源，为城市发展预留空间；可方便管线的维修、保养和管理，提高城市基础设施的安全性等等。

为推进共同沟的建设，这些国家和地区往往打破“谁拥有、谁管理”的各自为政的管理体制，成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如日本在中央建设省下设了16个共同管道科。另外，发达国家和地区往往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和相关信息披露机制。

我国国内共同沟的建设起步较晚。1992年，上海市政府规划建设了大陆第一条规模最大、距离最长的共同沟——浦东新区张杨路共同沟。共有一条干线共同沟、两条支线共同沟，其中支线共同沟收容了给水、电力、信息与煤气等四种城市管线。随着近几年全国掀起的新一轮的城市建设热潮，越来越多的大中城市已开始了共同沟建设的试验和规划。但直到目前，共同沟还仅在我国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和新区有所建设，尚未得到推广和普及。

应当说，共同沟建设属于一次性投资，投资



2005年1月，日本东京市政当局在地下40米深处建设集电话、电气、天然气、上下水道等公用设施在内的共同沟工程。

地下管线被视为城市发展的“良心”。然而，由于城市发展的长期性，我国地下管线铺设的年代相差很远，特别是在一些老城区，人口密集，建筑密度大，地下各类管线纵横，年代久远，平时检修非常困难。再加上这些年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急剧发展，对供电、给排水、管道煤气、通讯等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需求不断增加，错综复杂的地下管线已呈“蜘蛛网”之势。市政公用事业分属不同的单位建设和管理，由于建设时间不同，并没有对城市地下空间进行统一规划和综合利用。随着城市的发展，管线设施增加，改造、维修、抢险比皆是，导致城市路面像拉线一样不断被挖开、填埋，给城市生活带来极大不便。